

探寻了不起的长城

齐长城： 长城建筑的鼻祖

■ 闻文

绵延千余里的齐长城横亘在齐鲁大地上，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齐长城作为齐国一项巨大的综合防御体系，见证了诸侯雄起、竞相攻伐的春秋战国风云。它不仅是国内最早的长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城，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A 军事设施 千里齐长城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各诸侯国在原有关隘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驻兵御敌，长城便是各诸侯国保卫疆土的重要防御设施。齐国，公元前1046年建立，历经姜齐、田齐两个时期，公元前221年灭亡，历时800余年。齐国以工商立国，是先秦时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齐国的富庶容易招致其他诸侯国的侵略。因此，齐国修建长城既有构建与他国间商贸交往秩序的需要，又是为了防御战争。

齐长城的修筑受到地缘政治、地理环境的影响。谋士苏秦将齐国列为“四塞之国”：“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四塞”即以山河为天然屏障。淄潍平原是它的腹地，环绕淄潍平原的西南、北面和西北面，有两条大河，即清济浊河；东面、东南面和东北面，是小海和大海，即今天的渤海、黄海；南面有一条连贯性很强的泰沂山系横亘东西，就像一道大院墙。所以齐国在地缘政治上相对独立，战略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自西向东，齐长城防御的国家，春秋时期分别为鲁国及晋、吴等盟国，莒国及晋、越等盟国；战国时代，则主要抵御三晋和楚国。

B 因地制宜 奇匠夺天工

齐长城的修筑体现了齐国人利用自然地理优势的理念，最早的西段齐长城大约修筑于春秋晚期，很可能是利用古济水堤防再筑墙加固形成。战国中期，楚国北上，齐国南部形势紧张。在交通路口和关隘上筑工事，建要塞的防御战术已经不能适应新出现的骑兵作战方式，于是全线防御的战略设想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余里。齐宣王所做的是国防线上拾遗补缺工作，以前不需设防的高山长岭上有些地段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就以山代城；需要筑城的地段土少石多，便就地取材，以石砌城。由此形成了山地防御、济水防御、东海防御连为一体的齐长城防御战略结构。山地防御的重点在于长城所经的各关隘和谷地，这些关口都设立要塞，长城高且厚，有城门，且配备戍所、武库、烽火台等，敌人很少能突破这些山地的关隘要塞。

综观齐长城的建筑设计，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就地取材的特点，故而现今所见长城不是整齐的统一设计，而是多因山势和河堤渠防而筑，平地、河流、低谷处重点设防，以确保进出方便，能攻易守。

C 防御至上 齐人兵家文化

齐长城同样体现了齐人的兵家文化和军事思想。以孙武和孙臆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首先强调的是防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有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齐长城正是在这一军事理论原则指导下兴建的。

在齐国的防御体系中，齐长城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齐长城是由长墙、关城、障堡、烽燧以及长城内外的军事重镇等有机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它将整个齐国的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完整地圈了起来，使原本流动的战场变成较为固定的战线。齐长城的军事功用体现在：第一，和平时期，为齐国节省大量的戍守兵力；其次，战争时期，可以有效迟滞战火向齐国腹地蔓延，赢得调动兵力、组织防御的充裕时间；第二，使齐国军队先处战地以主待客，以逸待劳，有效打击屯兵于坚城之下的敌军，歼灭其有生力量；第三，即便防御失败，也为齐国坚壁清野、撤退转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第四，齐军可以依托长城防线主动出击，建立前沿据点和防线，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的。

齐长城作为全局性、永备性的军事战略工程，是齐国最为重要的一道防线。战国时代的楚国货币于齐长城以南屡有出土，而长城以北却没有发现，被学界视为长城防御成功的一个旁证。战国时人论及齐国南部国防屏障时，总要提到长城巨防。如《战国策·秦策》中张仪云：“（齐）长城巨防足以塞。”齐长城不仅有力保卫了齐国的国家安全，还是齐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塑造了齐国对外开放的传统格局。齐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是中国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澜壮阔的中国长城建筑史是由齐长城开始的。



江口沉银遗址出土“蜀世子宝”金印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 童芳 陈健）近日，记者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至2020年度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共出土以金银器为主的文物10000余件，其中一枚“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

江口沉银遗址是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与明朝参将杨展展开战的战场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6年底开始对该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

据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刘志岩介绍，今年1月10日开始发掘，历时约3个月，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约10000平方米。

本年度共出土文物10000余件，主要为金银器，包括金银币、金银锭、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

银服饰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一枚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纽，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印台边长约10厘米、厚约3厘米，含金量高达95%。“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

本年度还发现多个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银锭，对研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具有重要意义。继上一年的工作中发现火铳之后，今年出土了不同大小的铅弹，是判定江口为古代战场遗址的又一佐证。

刘志岩认为，为数众多的金银容器、金银服饰

和金银首饰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的工艺水平、服饰制度以及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除此之外，本年度的考古还确认了文物在水下的分布状态、埋藏迹象等，对还原“沉银”前的分船及分箱状态等历史细节提供了宝贵材料。

“本年度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蜀世子宝’金印的发现，堪称重大考古发现。我们对遗址本身尤其是文物分布规律的认识取得重要突破，对未来的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刘志岩说。

据了解，下一步当地将在江口镇两江交汇处建设江口沉银博物馆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口工作站。